

近代小说 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

施晔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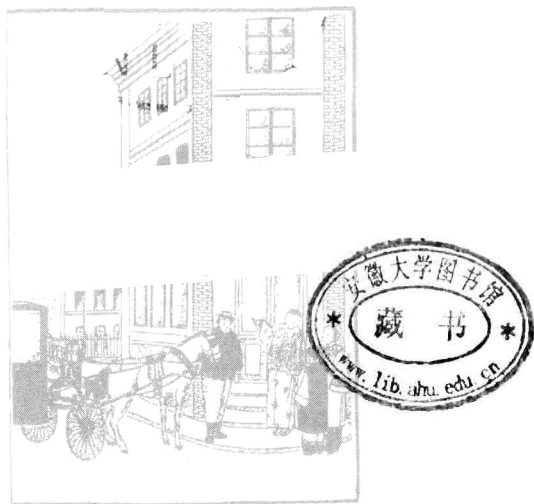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近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10YJA751061) 终期成果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
杨剑龙 主编

近代小说 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

施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 / 施晔 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495 - 3466 - 1

I. ①近… II. ①施…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0835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划编辑: 刘冬雪

责任编辑: 刘冬雪

装帧设计: 黄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00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

——都市文化研究论丛总序

杨剑龙

早在2002年,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就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由我填写申报的表格。当年因为都市文化研究没有学科的落脚点而未获批准。2003年,由我领衔再次申报,填写申请表格,组织相关人员,搜集有关资料,进京修改表格,迎接专家组现场考核,甚至当场背诵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2004年底,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归入学术综合类基地。地方院校获得这样的基地是十分不易的。在学校的支持下,在诸多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有当代都市文化、国际都市文化比较、都市文化史三个研究方向,聘请了三十余位专职与兼职的研究人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采取项目管理的模式,每年申报两个重大项目。2004年以来,中心已设立了18项重大项目。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来,基地人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项、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2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1项,另有上海市教委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及其他横向项目几十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三十余项。

中心积极承担政府和社会的决策咨询任务,主持了多项政府决策咨询项目,并多次获得政府决策咨询奖。自2009年始,我被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为市政府的决策出谋划策。

按规定重点研究基地每年要主办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了诸多国际都市文化比较的学术会议,如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巴黎、上海与博茨瓦纳、上海与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等,还举办了不少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小型的学术沙龙等。中心积极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筹备及相关活动,并得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执委会的表彰。中心有《都市文化研究》学术刊物(CSSCI类集刊)和都市文化研究网站。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熊月之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25本(上海辞书出版社),苏智良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都市文化及其对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出版《上海城区史》上下卷(学林出版社),杨剑龙领衔的基地项目“上海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发展与嬗变”出版“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丛书”8本(上海文化出版社)等,中心研究人员出版学术著作、研究译丛,发表学术论文,仅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的论文就有14篇。中心主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都市文化研究译丛”、“都市与文化译丛”对于国外城市理论的引进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2010年5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顺利通过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次评估,在学术综合类25个基地中名列前茅。

基地建成以来,教育部社科司领导袁振国、张东刚等多次亲临基地视察与指导,研究中心也得到了上海市教委历任领导的扶植和指教,以及上海师范大学领导的关心和帮助。2007年9月6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委秘书长丁薛祥、副市长杨定华,在市科教委党委书记李宣海、市教委主任沈晓明的陪同下视察都市文化中心。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希、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上海市高教学学会会长张伟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伟、中共奉贤区委书记时光辉、区

长庄少勤等,都曾到研究中心考察指导。

都市文化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是人们在都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括物质形态的城市建筑、园林、教堂、公共文化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也包含精神形态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宗教、法律、习俗及市民的生活方式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化的典型。在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呈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建设、咨询服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心尽力,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呈现了基地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丛书包括杨剑龙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郑崇选的《都市文化生产与文化形态转型》、王琪森的《海派书画艺术研究论》、程郁和朱易安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钱智的《长三角都市文化:演进与体验》、施晔的《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与社会变革》、杨剑龙的《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朱鸿召的《文化民生论》、彭善民的《趋于治理:1949年以来上海的毒品控制》9部,涉及了文化批评、文化生产、书画艺术、职业妇女、区域文化、城市小说、文化文学、文化民生、毒品控制等诸多方面,呈现出都市文化研究丰富与复杂的多重面相。

自2004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已走过近十个年头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都市文化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在研究中心体制欠完善的境况下,作为基地主任的我虽任劳任怨、竭力支撑,每年策划两个重大项目的申报,每年主办国际会议,每季度撰写基地汇报,每年呈送基地年度总结报告,等等,却常有独木难支、力不从心之憾。在中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下,我仍将会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尽心尽力。

2013年3月8日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

(代序)

孙 逊

近年来,讨论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关系的文章陆续出现。^①城市如何通过成为故事叙事中的重要元素影响小说的写作,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学术课题。

基于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不是一般性地研究小说中所描写的有关城市的内容,而是特别关注作为空间性存在的城市与小说的内在关系,将城市作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的,具有多重空间性特征的物质与文化存在来加以认识和思考。^②在这一认知下,研究古人生活于其间的城市空间与小说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具

① 有关城市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西方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等,是公认的力作。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开始得到重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现当代文学方面。重要成果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李书磊的《都市的迁徙》、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古代中国城市与文学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专著只有方志远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和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等。较有影响的研究论文,有刘勇强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宋莉华的《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孙逊与葛永海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等。

②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有时代特征的城市多重空间对于小说的深远影响,并尽可能地给予现代的阐释,便是本文的目的。

一、城市地理空间在小说中的展示和聚焦

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①

——凯文·林奇

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不仅会影响作家的小说写作,而且由于城市的变迁,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再现其城市空间以获得真实感和现场感的时候,其城市书写也就必然受制于具体的城市地理空间,从而使其书写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对所描写的城市从整体上进行了描绘。然而,由于小说家毕竟不是地理学家和城市学家,他们对于城市整体的宏观把握,往往比较笼统,除了一些专门性的地理类笔记,如《东京梦华录》等之外,多数小说只是把城市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背景来处理。但即便如此,由于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其对城市的描写并不缺乏细节的真实性。例如在《任氏传》这则著名的唐代传奇中,许多重要情节描写都与唐代都城长安真实的城市地理空间联系在一起:

唐天宝九年夏六月,崑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崑乘白马而东,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②

①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②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五二《狐六》,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2页

唐代都城长安,原为隋代起建的新都大兴城,先制定规划,修筑城墙,开辟街道,逐渐筑成坊里,采用严格而整齐的坊制。宋程大昌撰《雍录》卷三《唐朱雀门外坊里》载:“京都四郭之内,纵横皆十坊,大率当为百坊,而亦有一面不啻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①新昌里,坊名,在长安城市东面延兴门旁。^②宣平,坊名,东面紧邻新昌里。升平,坊名,为宣平坊南面的邻坊。可以看出,郑子所走的线路是符合长安真实的地理空间的。郑子和崑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坊之南,郑子推托有事离开,乘驴而南,入升平坊北门,于道中偶遇任氏等三个妇人,郑子随之,东至乐游园,在任氏家中发生了“一夜情”。(按:乐游园即乐游原,为长安游览胜地,其位置正在升平坊东面的升道坊内。)郑子所经过的四个坊恰好在空间位置上形成一个“器”字形,左上为宣平坊,左下为升平坊,右上为新昌坊,右下为升道坊。郑子走的是一条逆时针的线路。这里,可以说城市地理空间的展开一丝不乱,达到了惊人的真实;而在这真实地理空间中所发生的故事,则是人与狐的“一夜情”。小说以真实的长安为故事的发生地,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反映城市空间,小说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真实的坊市之间往来活动。而小说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情节是:“将晓,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各系教坊,职属南衙,晨兴将出,不可淹留。’乃约后期而去。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这一情节也真实反映了唐代的城市制度:唐代长安每天入夜即在承天门(宫城正门)击鼓,各坊、里闭门,街上禁止通行。到五更三筹,再击鼓,坊、里门才开,恢复交通。宋程大昌撰《雍录》卷三:“自朱雀门南即市井邑屋,各立坊巷,坊皆有垣有门。随昼夜鼓声以行启闭。……启闭有时,盗窃可防也。”^③坊门关闭后,街上就断绝行人,否则就是犯禁,或者叫做“犯夜”。法律规定“诸犯夜者答二十”^④。小说中这一反映城市制度的情节正

① (宋)程大昌:《雍录》,黄永年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52页。

② 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6页。

③ (宋)程大昌:《雍录》,第53页。

④ 《唐律疏议》卷二六《犯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以与史互证。

在唐传奇中,以真实的坊市名称来描写长安是比较常见的。然而,在这些早期的小说中,对于长安的描绘也只停留在仅仅提及坊里名称的水平上,直到宋元以后,情况才有所变化。例如小说中对北宋首都汴梁的描写,就远比唐传奇中的长安来得丰满充实。如在《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中介绍北宋汴州:“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①在《水浒全传》第七十二回中描写东京:“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迭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照楼台。”^②

这里,小说对于汴京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城市建筑的富丽堂皇等都有所涉及,但也是十分笼统的,就如同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画,不在精雕细刻其形,而重在写出一种整体的精神、意态和氛围。这种城市书写特征,在古代小说中是十分普遍的。如《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写苏州:“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③《醉醒石》第一回写南京:“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蟠虎踞,帝王一大都会……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变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④《儒林外史》对于南京市面的繁华、人气的旺盛更作了细腻传神的描绘:“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

① 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②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8页。

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④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页。

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而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①

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小说对于城市空间的整体书写，多数是比较笼统的，只有少数作品着墨较多，显示了细腻写实的特点，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与西方小说对于巴黎、伦敦等城市的细致书写相比。^②

小说中真实的地理空间描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以城市地标为主要对象，围绕着能够代表城市特征的地标性建筑展开故事情节。这样，城市的地标作为故事场景经常出现，并逐步演变沉淀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如温庭筠《华州参军》：“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③引发了一段浪漫的男女恋情。唐人以城市地标为爱情故事的场景，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汴梁之有金明池，杭州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瘦西湖等。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归叟诗话》道：“王荆公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④北宋东京城市地标以金明池最为著名，在话本小说中往往成为城市市民游赏的去处和市井男女艳遇的场所。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人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

①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293页。

② 参见[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黄福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四二《鬼》二七，第2713页。

④ 周城：《宋东京考》，中华书局，1988年，第186页。

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而小说中所叙故事就发生在“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这范二郎立地多时,细看那女子……那女子在茶坊里,四目相视,俱各有情。”^①于是一段市井爱情故事由此展开。《志诚张主管》的故事同样从“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开始。^②

明清时代南京的城市地标之一就是秦淮河了。《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第四十一回:“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③《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诸多人物和故事,都和秦淮河相关联,或以秦淮河为背景,而小说对秦淮河描写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又是以前有关城市地标描写的小说所远远不及的,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小说有关城市书写的不断进步和深化。

上述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具体场景,往往是一个城市中真实的地名,皆有文献笔记材料可证。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即小说家分明是要突出和强化故事时空的当代性和真实感,才刻意地表现出一种写实或仿真的创作意

① 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0年,第786—787页。

② 同上,第725页。

③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97—298页。

向。小说的时代感和真实性的增强,能够使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故事世界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幻觉,从而激发起阅读的兴趣。

在小说中,反映城市地理空间的方式除了上述以真实城市空间为基础的方式之外,还有大量的的是以虚构的地理空间来展开叙事的。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中,可以更自由地展开各种故事叙事,同时也有利于表现和建构理想性世界。《红楼梦》所描写的发生在京都贾府中的故事,便是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展开的。在这样一个虚拟城市空间中,作者可以尽情施展笔墨,发挥丰富想象,演绎复杂曲折的故事,正如《红楼梦》第一回卷首脂批所点明的:“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京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①《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似是长安,小说第十五回写王熙凤弄权铁槛寺,让来旺儿找人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可证。但小说中更多的是出现“都中”、“京中”、“京都”、“神京”等字样,是一座虚化了的都市空间,其实暗指的是北京。这种把真实的城市空间予以虚化处理的手法,更强化了《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特色和效果。

小说中虚拟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理想性世界的建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书写。以往红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找寻和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其实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大观园是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它既与外部的肮脏世界相对立,也被外在的世界所侵扰和摧残。^②这种虚拟空间的描写,形成了作品虚幻的梦境式的艺术特征,而这些虚拟性描写又往往与前述真实性的城市书写结合在一起,真假相杂,虚实相生,丰富着小说的内涵与意象,体现着中国美学的精神和理想。因为正是在小说真实与虚拟的城市书写的对立与对比中,展示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

① 《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② 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55页。

向,体现了作者因为不满足于当下的现实空间而对于理想空间的建构。这种理想空间也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或者几何学的存在,而是人类经验和文化想象的产物。

二、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①

——王国维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首先是政治的中心,士人到都城来追寻自己的政治前途,即选择了或者说无奈地卷入了城市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

发生在唐代最重要的政治空间——长安城中的,有著名的牛李党争。唐穆宗、宣宗年间,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的“李党”,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两大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数十年之久的朋党斗争。自陈寅恪、岑仲勉一直到傅璇琮、黄永年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成果丰富而聚讼纷纭,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不深论。本文关注的,是在运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的唐传奇中,往往是联系到长安的居住空间的描写,来达到讥刺、攻击甚至毁谤对方的目的。丰富而真实的城市政治生活,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曲折生动的素材,而牛李党人在长安城中的居住空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② 杨虞卿是牛党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钱易《南部新书》卷丙记载:“咸通中,杨汝士与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② 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第351页。

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①靖恭坊正南与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对,正西与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东西相对。

李党文人擅长以小说影射异己和毁谤对手,李党文人所写的《牛羊日历》,《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牛羊日历》中有这样的描写:“(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②作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与杨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夹街对门仍然不满足,杨虞卿又别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墙东,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党人物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监视和观察街对面的李党的活动情况。这些举动,自然成为李党政治攻击的口实。而揭露牛党“列烛往来”,一方面揭露了其政治活动的密切与频繁;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出李党对于牛党活动的密切关注和监视,否则,又如何知晓牛党之间“列烛往来”的情形?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间,为政治斗争双方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对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才会有以上借居住空间的生动渲染来攻击的影射文学出现。

作为政治象征的都城往往并不在小说中正面展开,而是隐入小说描写的背景,作为一种王朝政治中心的象征,在背景中凸现出来,例如《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中的东京,《红楼梦》中的神京等。在《水浒传》中,与东京相关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误入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在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中,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也写到了东京的元宵节,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仍然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描绘。有关东京这一城市的描写,只是起着烘托其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小说中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第一次是第十八回,宇文虚中上参本弹劾蔡京、杨戩等,祸

① 钱易:《南部新书》卷内,《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② 缪荃孙辑:《藕香零拾》,中华书局,1999年,第104—105页。

及西门庆,西门庆忙派遣家人来保往东京打点。小说中仅仅简单描写来保到东京,向当朝右相李邦彦献上金银,李邦彦将“西门庆”改作“贾庆”,使得西门庆逃过一劫。第二次是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向太师蔡京送上生辰纲,蔡京接受重礼之后,给了西门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位,于是西门庆由一个横行乡里的恶霸、暴发户,变成了掌握一方生杀大权的理刑官。第三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往东京庆祝蔡京的寿诞。在小说中,对东京城市空间具体描述很少,但是东京作为君临天下的政治权力中心却始终对西门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命运和前程。隐匿的城市政治空间,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在西门庆的人生经历和清河县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重大影响。《红楼梦》中的神京也是如此,从贾雨村的复职到王熙凤的弄权,时时暗示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京城,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以笼统的神京掩盖真实的京都地名,更赋予了京城象征符号的意义。

因此,无论是东京还是神京,在作品中,更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城市政治空间,对于众多士子和广大百姓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似乎是一个虚无的幻影,一个抽象的所在,但同时它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官员的身家性命和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京城意象,作为政治中心弥漫于整部作品之中,虽然未见确切具体的细节描写,但你却时时可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和对于小说人物命运的巨大影响。

西方城市学家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①作为政治空间,城市也是一座文化的空间。而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则承载着国家典礼、大型祭祀、节日庆典和人才选拔等文化活动,其中又尤以科举选拔对于士大夫及其小说创作影响深远。科举制度在中国历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情感与命运。而决定命运的考试,都是在各级行政权力所在地的城市中举行,参加科考的士子在城市中的活动,也自然成为小说书写城市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自中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及士人的重视。通过进士科考试,博得功名利禄,是人生正途,是实现政治抱负及人生价值最主要的渠道。而在唐代,由于科举还没有形成宋代以后严格的考试制度,士子的名气,在科考中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为达此目的,士子们在京都竞相上演着各种活动。

一个著名而且典型的故事是《王维》。王维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名籍甚,公主以词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这时王维也将应举,言于岐王,也想为解头。岐王于是给他出计,资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王维独奉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大奇之。王维乘机献怀中诗卷呈公主。公主既读,惊骇曰:“此皆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岐王又乘机为王维说项:“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便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王维遂如愿作了解头,而一举登第。^①这则故事,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②,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具有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古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展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具体的生活情景。

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同时也是市民节日庆典和民俗活动的场所。这里仅以上元节为例,来透视这一城市多重文化空间交织起的文化场域(皇权、士大夫、市民、游客)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中国古代小说中,许多发生在城市中的故事,都是以上元节为背景展开的。《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金鲤鱼迷人之异》,是从“上元佳景,京中放灯甚多”生发出来;《东京判断赵皇亲》也是从“是时正月上元佳节,西

① (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七九《贡举二》,第1332页。

② 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5页。